

近期,网上热传“2016年十大网络流行语”“汉语盘点2016年度字词”,再次引发人们对网络流行语的关注。有人说,使用网络流行语的一大影响是我们都患上了“语言贫乏症”;也有人说,网络流行语是一种语言上的“病症”,是语言文化的“毒瘤”。事实真是这样吗?语言学家钱乃荣对此问题的解读是——

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走向多元化,语言也是多元化的。其实过去也是如此。比如,诗歌有诗歌语言,我们平时不可能用诗歌语言来讲话。仔细分析诗歌语言,语法大都是不对的。因为它是精练的,讲究言下之意。法律语言则非常严谨,非常规范,这也是一种语体。

过去,有些人认为语言只有书面语、口语两种语体,其实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语体已经有十几种。网络语体也和广告语体、诗歌语体、法律语体、新闻语体一样,是众多语体中的一种。

为什么网络出现以前,语言的变化没有现在大,新词也不像现在这样多这样活跃呢?因为在过去,文体差异比较小,参与写作、发表文章的人也很少。要出版一本书,要发表一篇文章,都要经过媒体编辑修改,如果其中有的地方写得不够规范,会被编辑删掉。几乎所有的文章都由媒体编辑“过滤”之后再发表,所以这些文章都呈现出一种统一的格调和样式。

但是,网络时代彻底改变了以前的格局。每个人都是自媒体,每个人都可以写作,都可以发表文章,真可谓百花齐放。有的网络作家一年能写好几十万字。而大家写出来的东西,其实也就是大家平时说的话。而且,一些比较有创造力的人还发明了一些新词。造出来的新词经

伯希和(Paull Pelliot)在国际汉学界几乎是一个神话式的人物,也因带走敦煌藏经洞的大量写卷、幡画受到众多批评。他是享誉世界的学者,还是臭名昭著的强盗?

千佛洞石窟数量众多,内容极其丰富,考察工作容不得半点拖沓。另外,并非所有洞窟都值得研究,例如伯希和对17号洞窟只写了寥寥几笔:“洞很小,没什么意思。”还有16号石窟:“洞很小,常见的风格,没什么。”以及160号洞窟:“洞很小,古代风格。”而163号洞窟却激起了伯希和的兴趣,可惜藏经洞上了锁。一名僧人诚惶诚恐地向伯希和解释说,发现藏经洞的王道士受甘肃兰州官府委托担当看守人,但他现在不在。这样的话,自然也就进不去了。王道士去哪了?也许在敦煌。

伯希和只好返回敦煌,在那里找到了王道士。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汉人,穿着道袍,头上戴着一顶道冠,下巴上留着小胡子,笑容可掬,模样谦恭。他对伯希和说,是神灵托梦给他,他才发现了藏经洞。实际上,藏经洞在1900年被发现纯属偶然。

当初,王道士主动承担起修缮通向佛造像和施主画像的廊道的任务。他在一座封在墙里的石碑后面发现藏

## 我们的语言变贫乏了吗——网络时代,网络语体,网络语言

过网络的广泛传播,被大家认可了,大家都朗朗上口了,就翻新了语言。

语言有一个基本特点,叫做“约定俗成”,这是语言学概论中的第一条。

和其他语体相比,网络语言就是一种社会的直接反映,它更接近口语,人情味浓,个性化强。作家金宇澄的小说《繁花》,里面都是短句,符合口语真貌,基础来自于上海话。其实只有书面语是比较长的,可能是受西方语言的影响。汉语口语都很短小,所以网络语言也很短小。

因为有了网络这个平台,共同的创造,平等的参与,网络语体变得更加真实,更直接反映各种人的各种情绪。平时人们嘴里说的话有的比较粗俗,因此网络语言也有粗俗的一面,但这也是一种真实的反映。一般来说,文明的社会总是会有自我净化的功能,老百姓自然会择优除劣,约定俗成本身就是优胜劣汰。

大量的网络创新词,如果只是少数人用,那么过一段时间就会消失。如果很多人在用,那么也有可能保存下来甚至得到发展。

老的词也是这样,它们也曾经是新词,后来使用越来越少。比如《汉语大词典》里有很多词语可以说已经“死”了,而且死掉的词语是不会复活的。语言最像生物体,当大家都不用这个词的时候,这个词就“死”了。

但更多的情况是新的词和老的词并用。比如,“东西”这个词也曾是群众的口语,本来叫做“物”,但后来随着口语化叫“东西”。现在网络语言叫“东东”,如果以后用的人多了,“东西”也可能被淘汰,改叫“东东”。语言的变化就是这样。但目前来说,“东东”和“东西”的意思还是有所不同,前者更幽默轻松一些,所以也可能只是多了一个近义词,谁也不会取代谁。

2000年网络刚刚流行不久,我当时在大学里上课,发现有一批80后的年轻人在网络上造了很多新词,我专门搜集了上海话中的流行语,一共搜了2500条。2005年的时候,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曾经做过统计,每年新增的网络新词达到几千条。你说语言是丰富了还是贫乏了?

主编《英汉大词典》的复旦大学陆谷孙教授曾经在一次报告中说,他有一次去美国,晚上在电视节目中收看当时美国年轻人中最流行的一部美剧,他发现有一半的词听不懂,因为其中有很多是美国青年中新流行的方言、俚语和网络语言。

网络新词大多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造出来的,因为年轻人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个是爱创新,一个是爱从众,所以导致网络新词的传

播非常迅速。有人说网络时代的语言变得贫乏了,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看不懂、不熟悉网络语言,不能接受新事物,于是就乱扣帽子。

而且在我看来,网络时代的流行语反而比以前的流行语质量更高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上海的流行语大多是从自由市场等地方开始流行起来的,创造流行语的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这些流行语只是从一个小区域诞生,在一个小的社群里使用。而现在网络时代的流行语都是在比较大的范围里迅速传播使用,而且使用这些流行语的人文化层次普遍较高,至少都是平时使用电脑的大学生、白领们。网络使流行语从阶层性发展到全民性,从口语进入书面语。

为什么我们说网络语言是越来越丰富而不是越来越贫乏?这还和人类使用的工具有关。最早的甲骨文,因为是刻在龟背兽骨上的,受书写材质局限,所以文字只能很简短。尽管秦始皇令李斯统一汉字为“小篆”,但是从近年来出土的秦简中上万个汉字及再以前的秦国睡虎地竹简上所写的汉字,证明当时的汉字已经是在向着隶书进化的字体了,因为书写工具变成了毛笔。到了宋朝,活字排版的发明又将语言文字推向平民化,大大促进了通俗文学的繁荣,白话文语体形成了,同时简体字也出现了。

现在到了网络时代,我们使用的工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语言将面临更大的发展。人人参与的网络,真实地反映了人们语言的面貌。全民发明传播新词的时代来临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发明出丰富的语言,语言也就具有了更彻底的约定俗成性。

(摘自《解放日报》)



里面三面墙上都堆满一人多高的书卷,每面墙都有两三层卷子。大量藏文写本夹在两块木板之间,用绳子捆着,堆放在一个角落里。其他书捆里也隐约可以看到一些汉文和藏文文字。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刻。

要逐个展开藏经洞中一万五千至两万册藏卷,我没有时间进行过多思考,否则六个月也看不完。但我至少要把所有卷轴都打开一遍,辨认每个卷子的性质,看看是否有新发现。第二步要把卷子分为两类,一类是精华部分,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拿到手;另一类也要努力争取,但必要时可以舍弃。尽管我很努力,这项工作还是花了我三个多星期时间。头十天里,我每天翻看将近一千册卷子,这肯定创下了纪录,因为平均每小时要在洞里翻阅一百册卷子,那是文献学家在用开车的速度翻看写卷。后来,我放慢了速度。开始时我有点疲劳,书捆里的灰尘让我喉咙很难受。接下来,我开始和王道士讨价还价,我想尽快谈妥,避免耽误更多时间……不仅对一册卷子是如此,对一页破纸也应如此,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这堆破纸片有什么价值。只要未经过我的手,就不能排除里面有我需要的东西的可能性。

(节选自《伯希和传》,[法]菲利普·弗朗德兰著)

【阅案所得】

## 英国人如何治霾

从最早的时候起,雾对交通的影响就是一个麻烦,而在有关17世纪的伦敦生活的记录中,它更是具有突出的地位。古物研究家安东尼·阿·伍德(Anthony à Wood)记录了1667年11月11日发生在伦敦的一次大规模雨夹雾天气,当时“马在奔跑中互相冲撞,大车撞着大车,长途公车撞着长途公车,如此等等”。

在旧日的《笨拙》(Punch)周刊中,有一幅漫画中画了两个面目模糊的男士,漫画上的说明是:雾中迷路的行人问,“请问到泰晤士河怎么走?”湿淋淋没戴帽子的陌生人答:“直走。我刚刚从河里爬出来。”这就是当时《笨拙》周刊的典型幽默,但真的有一次,一行7个人就因为雾而一直走进了泰晤士河。

1952年12月5日—8日,一场灾难降临英国伦敦。地处泰晤士河河谷地带的伦敦城市上空处于高压中心,一连几日无风,风速表读数为零。大雾笼罩着伦敦城,又值城市冬季大量燃煤供暖,排放的煤烟粉尘在无风状态下蓄积不散,烟和湿气积聚在大气层中,致使城市上空连续四五天烟雾弥漫,能见度极低。在这种气候条件下,飞机被迫取消航班,汽车即便白天行驶也需打开车灯,行人走路都极为困难,只能沿着人行道摸索前行。由于大气中的污染物不断积蓄,不能扩散,许多人都感到呼吸困难,眼睛刺痛,流泪不止。伦敦医院由于呼吸道疾病患者剧增而一时爆满,伦敦城内到处都可以听到咳嗽声。仅仅4天时间,死亡人数就达4000多人。两个月后,又有8000多人陆续丧生。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伦敦烟雾事件”。

酿成伦敦烟雾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冬季取暖燃煤和工业排放的烟雾在逆温层天气下的不断积累发酵。可悲的是,10年后,伦敦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烟雾事件,造成1200人非正常死亡。

法国画家莫奈笔下的伦敦,被世人公认为他最具代表性的印象派作品。他从圣托马斯医院二楼露台远眺,将烟雾弥漫的泰晤士河与国会大厦一幅幅定格在画板上。如今,莫奈的作品也成为19世纪后期伦敦空气污染的最直观历史档案。

英国人如何整治空气的呢?

早在1306年,英王爱德华一世颁布的“禁止在伦敦使用露天燃煤炉具”敕令,可以算得上是世界首个有关空气污染防治的法令,但是这项异乎寻常的严苛法令不久就败于人类对能源的强大需求。毫无节制地用煤也让英国尝到苦果,从19世纪开始,伦敦就戴上了“雾都”的帽子。

1952年的“毒雾事件”后,英国人开始反思空气污染造成的苦果。1956年,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出炉。法律规定在伦敦城内的电厂都必须关闭,只能在大伦敦区重建,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还包括要求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逐步实现居民生活天然气化;冬季采取集中供暖。

1968年以后,英国又出台了一系列的空气污染防治法案,这些法案针对各种废气排放进行了严格约束,并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措施。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数量持续增加的汽车取代煤成为英国大气的主要污染物。到90年代初,汽车排放的其他污染物如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不稳定有机化合物也成为密切关注的对象。这些物质在阳光中的紫外线作用下发生复杂的光化学反应,产生以臭氧为主的多种二次污染物,称为“光化学烟雾”。

为了解决依然棘手的空气污染问题,伦敦开始全民动员。2003年伦敦推出交通拥堵费,限制私家车进入市区,并计划到2023年把伦敦私车流量减少9%。与此同时,伦敦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网络,鼓励市民选择地铁或公交系统出行。从2012年1月1日开始,凡是车龄在15年以上的出租车一律停发营业牌照,此外在运营中的1200辆出租车也要进行新能源改造,并鼓励车主将伦敦标志性的黑色出租车改造成电动车。

(综合《大雾霾》等著)

## 收买王道士,『盗』走文物——伯希和在敦煌:「书中风云」

经洞,还发现里面的写本、彩绘、素描、幡旗和一批小型铜造像。很多卷子被当做礼物送给甘肃官员。一些朝圣的蒙古人前来查阅大部头藏文写本。后来兰州官府得知这一消息,但发现洞窟中既没有黄金也没有白银时,很快便对藏经洞失去了兴趣。

就这样,王道士一个人守护着藏经洞。他告诉伯希和,斯坦因在洞中考察过三天,买走一批写本。

王道士还说,英国同行付给他一笔钱,数量可观。伯希和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暗

